



全球海洋治理迎来新起点

中国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

□ 本报记者 赵阳

1月17日，一项历经19年谈判，凝聚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识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式生效。截至生效当日，已有82个国家及欧盟完成批准程序成为缔约方，145个国家签署该协定，标志着全球海洋治理从理念共识迈向制度实践的关键转折。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态，中方已正式申请将协定秘书处设在福建厦门，并于1月16日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交相关申办方案，为这一里程碑式协定的落地实施注入中国动力。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填补空白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诞生之路，是全球治理领域坚持多边主义的生动写照。自2004年联合国启动相关谈判以来，各国围绕公海资源权属、利益分配、监管机制等核心议题展开多轮磋商，因发展阶段、海洋利益诉求的差异，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案文曾保留数百个未决问题的标注。直至2023年6月19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政府间会议第五次续会上，各方最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协定文本，并于当年9月20日在纽约开放签署，签署期持续至2025年9月20日。

作为联合国框架下海洋领域的重要立法成果，《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生效填补了公海及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空白，构建起深海遗传资源、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四大核心制度体系，被联合国大会主席称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解决方案”。在全球海洋生态面临过度捕捞、污染蔓延、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的当下，这一协定的生效，不仅关乎海洋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更彰显了多边主义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核心价值。

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蒋小翼看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作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通过的重要国际海洋法律文件，其生效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首次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构建起有约束力的整体性法律框架。《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将公海纳入管辖范围，推动



图为2025年8月11日，“蛟龙”号在北极冰区载人深潜。

新华社发

公海从无序开发的全球公域向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承担保护责任的对象转变，填补公海治理的制度空白，促进公海秩序的完善与治理机制的健全。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生效将引发全球海洋治理的深刻变革，为海洋环境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朝法治化、合作化和多边化方向发展。”蒋小翼说。

国际社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生效给予了高度肯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称赞其为“海洋和环境多边主义的胜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格蕾特·阿吉拉尔赞许这是“全球团结一致共同保护海洋的强有力见证”；古特雷斯则称之为“海洋和多边治理的历史性成就”。

厦门申办彰显大国治理智慧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生效，意味着全球海洋治理从“规则制定”转向“落地执行”，在这一漫长谈判进程中，中国不仅是《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务实行动者。从开放签署首日即率先签署，到2025年12月向联合国交存批准书，再到成为正式缔约方，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生

效之际，中国正式申请将秘书处设于厦门。在1月2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郭嘉昆明确阐述了中方申办秘书处的考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有意愿、有能力为实施《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作出更大积极贡献。这也是为了促进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宗旨和目标、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厦门，这座素有“海上花园城市”美誉的滨海都市，历史悠久、生态宜居，开放包容，既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门户，也是海洋国际合作的关键节点。其优越的创新生态与蓬勃发展的蓝色经济，与协定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国愿为秘书处提供一流办公条件与运行支持，这不仅是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质贡献，更是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责任体现。

事实上，中国早已为履约做足准备。相关职能部门系统开展公海生物多样性科考，具备全海深、全海域探测能力，可深入马里亚纳海沟等极端海域执行任务。同时，正加快完善国内配套法规体系，在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管理方面，新增报告登记、溯源追踪、惠益分享等制度安排，确保履约工作规范有序。此外，通过“蛟龙”号载人深潜国际联合航次等开放平台，邀请多国科学家共探深海奥秘，并与近20个全球南方国家共建30余个联合海洋

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支持，这些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智慧。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申办表示广泛关注。联合国相关官员表示，中国在海洋生态保护、蓝色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使其成为秘书处东道国的有力候选者。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期待中国通过申办秘书处，进一步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的公平化进程，保障发展中国家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合法权益。

实现协定目标有赖各方努力

若厦门成功当选秘书处所在地，将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合作枢纽。秘书处将承担协定实施的协调、监督、信息交流等核心职能，为缔约方提供技术支持、能力建设服务，推动各方落实协定目标。厦门将依托其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为秘书处运行提供全方位保障，打造一个高效、透明、务实的国际合作平台。

中国始终与国际社会一道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截至目前，中国已与5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海洋合作协议，构建起多层次蓝色伙伴关系网络，通过联委会、学术研讨等机制深化务实合作。在能力建设领域，中国牵头成立的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中心等平台，已为发展中国家培育大批海洋科研人才。《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生效后，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合作维度，推动深海探测、海洋保护区管理等领域的国际协同。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生效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里程碑，但生效并非终点。其目标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各方的共同努力。”蒋小翼认为，中国需持续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执行进展，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积极推进国内法治、深化国际合作中落实协定措施，为全球海洋保护事业贡献力量。

作为多边主义的胜利果实，《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落地离不开各国携手。中国主动申请在厦门设立秘书处，正是负责任大国担当的生动体现。正如郭嘉昆在记者会上所说：“中方愿同各方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支持全面、准确、有效实施《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为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作出更大贡献。”

环球时评

□ 本报记者 王艺茗

当地时间1月1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联合国秘书长年度重点工作通报会上明确表态，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表态不仅重申了中方立场，更回应了世界各国对坚持多边主义的期盼，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确定性。

联合国成立80年来，多边主义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既是践行多边主义的核心平台，更是国际社会集体应对全球性威胁与挑战的关键枢纽。然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安全形势持续承压，地缘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给各国安全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个别国家执意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不正当手段损害他国利益，挑起地缘政治竞争。美国政府日前还宣布成立所谓“和平委员会”。有舆论认为，美方欲将所谓“和平委员会”打造成平行于联合国的机构，将损害联合国权威和工作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与积极践行者。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多次发出“维护多边主义”的时代强音，深刻阐明“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不变承诺。

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方面，中方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和平解决争端作为《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基石。中方一贯主张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上，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开展穿梭外交，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2025年5月，中方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作为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该机构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的机制空白，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全新公共产品，彰显了中国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创新实践。

中方主张并推进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作为联合国三大支柱，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必须始终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破解安全赤字提供实践路径；中方坚定地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并致力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77国集团和中国”的重要成员，中方在联大的建设性参与与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利益，并为增强发展中国家赋权作出贡献。

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方面，中方展现出鲜明的责任担当。去年9月，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并强调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与各方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倡议进一步彰显中方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承诺。支持联合国与时俱进、提质增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广大会员国的普遍期待，也是中方倡议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的初衷。中方还积极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进“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所作努力，期待通过改革提升联合国执行力、强化系统协同，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重视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世界就能获得安宁与发展；如果听凭个别国家我行我素，联合国这座多边主义摩天大厦的根基将遭到侵蚀。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之际，各国须牢记《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共护世界和平，共促全球发展。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权威，维护联合国地位，弘扬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韩国朝野达成共识彻查“统一教”

□ 本报驻韩记者 王刚

近期，由“统一教”（全称“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引发的政治丑闻持续搅动韩国政坛。这个长期游走于宗教与政治灰色地带的组织，因涉嫌大规模非法游说、行贿、干预选举等行为成为韩国社会公敌。在舆论压力下，韩国朝野打破党派壁垒达成罕见共识，启动包括特检组调查在内的全方位彻查行动。

“统一教”多重黑幕曝光

创立于1954年的“统一教”，自2012年创始人元正明去世后，由其遗孀韩鹤子接任核心负责人，逐步将触角伸向非法游说、干预选举与国家政策制定等领域。近年来，其多重黑幕接连被曝光。2025年9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韩鹤子签发逮捕令，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和《请托禁止法》，教唆毁灭证据、职务侵占四项罪名对其实施羁押，这是“统一教”创立71年来最高层首次被捕，标志着调查进入实质性阶段。检方调查证实，韩鹤子主导构建了一套覆盖选举干预、政策游说、利益输送的完整政邪勾结网络。

“统一教”世界本部前部长尹永浩通过录音供述承认，该组织掌握“关键选票”，并采取“不显露倾向”的策略双向渗透朝野政党。具体而言，在2022年总统大选前夕，尹永浩于2022年1月向国民力量党议员权性东提供1亿韩元非法政治资金，其中半数包装绣有“王”字，暗示与前总统尹锡悦存在关联。权性东此后还两次前往“统一教”总部带走疑似现金的物品。

更令人震惊的是，“统一教”将利益输送延伸至权力核心圈层。2022年4月至7月，该组织通过“乾津律师”全成培，向尹锡悦之妻金建希赠送钻石项链、名牌包等奢侈品，以此换取对该组织柬埔寨开发项目的政策支持。这些支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由教团资金统一支付，相关购买凭证在特检组搜

查中被查获，印证了组织化行贿的事实。

“统一教”的野心不止于干预选举，韩国多个项目成为其干预政府政策的抓手。2021年6月，韩鹤子的儿媳文然娥与国民力量党前紧急对策委员会委员长金钟仁会面，就韩日海底隧道项目进行讨论。另据了解，“统一教”旗下控制的媒体长期为该组织营造有利舆论环境，形成“媒体—政治—商业”利益闭环。

形成跨党派彻查共识

“统一教”的违法行径曝光后，迅速引发韩国社会强烈愤慨，也倒逼政界形成跨党派彻查共识。

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12月10日明确表态，下令全面彻查教派团体与政界的非法勾连，强调“不得因党派或职务而有所回避”，展现了推动调查的决心。今年1月12日，李在明与主要宗教团体领袖会面时进一步指出，“这些组织（指‘统一教’等组织）对我们社会造成的损害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遏制，而且已经相当严重了”，呼应了社会各界对“统一教”干预政治的担忧。

在总统推动下，韩国国会跨党派议员积极响应，支持设立特检组专门负责案件调查。由特别检察官闵中基领导的特检组，拥有独立调查权，重点围绕“统一教”与政界的资金往来、选举干预、政策游说等核心问题展开侦查。调查过程中，特检组采取了包括搜查“统一教”总部天正宫，扣押财务凭证，传唤关键证人等一系列强力措施，即便面对韩鹤子三次拒绝传唤的阻碍，仍坚持推进调查，最终成功促使其到案接受讯问。

由于“统一教”的非法游说和渗透不分朝野，既与国民力量党深度勾连，也向共同民主党提供资金支持，这种“全方位布局”使得韩国朝野任何党派都难以单独回避问题。在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韩国朝野政党意识到，唯有彻底查清真相、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才能重建民众对政治体系的

信任。因此，无论是执政党内部要求“清除害群之马”的呼声，还是在野党推动的调查提案，都形成了推动彻查的合力。

截至1月22日，调查已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果：除韩鹤子被逮捕羁押外，权性东等涉案政界人士被传唤调查，“统一教”内部会议记录、录音、财务凭证等大量证据被公开。特检组表示，后续将进一步追查资金流向，核实更多涉案人员，确保调查不留死角。

多维度发力强化治理

此次彻查行动不仅是对具体案件的追责，更暴露了韩国政党治理、邪教监管等领域的结构性漏洞。

当地媒体分析认为，韩国政党基层入党门槛低、高度依赖党员投票的制度设计，让“统一教”等组织可通过动员信徒集体入党快速获取投票权。此外，相关部门对“统一教”以“传教活动支援费”名义掩盖行贿，以“灵感商法”高压敛财等行为缺乏明确界定与处罚标准，加之跨境监管协调缺失，使得该组织能利用韩日美等国制度差异规避审查。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统一教”在日本因安倍遇刺案被取消宗教法人资格、财源被切断后，愈发依赖韩国政界庇护，而部分政治人物看中其组织力与选票资源，形成“互需”腐败链条。

面对制度性挑战，韩国正从多维度发力强化治理：立法层面，有议员提出修订《政治资金法》，明确禁止宗教组织向政治人物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与物品，扩大政治献金监管范围；政党治理方面，多个党派已启动党员资格审查，同时提高入党门槛，强化基层组织管理。此前韩国曾对“统一教”处以超1000亿韩元追缴税款的处罚，如今更借鉴日本在安倍遇刺后限制该组织高压募捐的经验，力求推动建立跨国监管协作机制，遏制类似组织的跨境政治渗透。

图片新闻

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遇阻



图为当地时间1月20日，法国斯特拉斯堡，来自欧洲各地的约5400名农民和700辆拖拉机在欧洲议会前示威，抗议签署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

CFP供图

欧洲议会1月21日投票通过将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南共市指南方共同市场，是南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交欧盟法院审查的动议。此举可能拖慢自贸协定批准进程并增加其生效的不确定性。欧洲议会议员以334票赞成、324票反对、11票弃权通过这一动议，请求欧盟法院就该协定文本是否符合欧盟条约出具意见。在欧盟法院给出意见之前，欧洲议会将无法就协定本身进行表决，而这一程序通常需要18至24个月。投票结果对欧盟支持该协定的相关方而言是一次挫败。这些支持方希望加深与南共市国家的关系，并将该协定视为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绝佳机会”。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举打着法律审查的旗号使用拖延战术，这对欧洲的经济利益和地位十分有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向议员们呼吁：“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的贸易伙伴越多，我们就越独立。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分析人士认为，在等待法院裁定期间，欧盟委员会等机构是否会选择对协定进行临时适用，值得关注。如果这么做，可能会造成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走向对立。

欧盟与南共市17日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正式签署自贸协定，这标志着双方朝着创建世界最大自贸区之一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一步。该自贸协定签署后，还需各国议会批准才能生效。

据新华社